

中国译学史

陈福康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 教 社

中国译学史

陈福康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译学史 / 陈福康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1
ISBN 978-7-5446-2377-3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翻译—语言学史—中国
IV. ①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8016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蔡一鸣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 字数 40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2377-3 / H · 1093

定 价: 39.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打开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刊《中国翻译》，在每一期第一页上印着的《本刊宗旨》的第一句话，便是“开展译学理论研究”。但是，“译学”一词却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被中文词典收入。谓予不信，请查大型中文语词工具书——新版《辞海》、《辞源》，乃至台湾版《中文大字典》、日本版《大汉和辞典》等等，还有《中国大百科全书》，都是找不到“译学”的。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疏忽和遗漏。因为“译学”一词通用已久，没有任何理由排除在词典和百科全书之外。

直到 1993 年，《汉语大词典》总算收入了“译学”一词，但其例句却很有问题。请看：

【译学】 翻译之学。陶曾佑《中国文学之概观》：“乃近今著作之林，更远超畴昔：彼汪笑侬之剧本，黄公度、蒋观云之诗，林畏庐、严侯官、马君武之译学，陈蝶仙、惜霜生之词曲，梁饮冰、刘光汉、章太炎、柳亚庐之论文，许冷血、天笑生、李伯元、喋血生之小说，均为一般文士所崇拜。”

上引书证中的“译学”，是与“剧本”、“诗”、“词曲”、“论文”、“小说”并提的，因此，它的意思绝对不是“翻译之学”，而是与之相对应的“译作”或“译品”。该词条显然举例不当，或释义不确。《汉语大词典》又是不注重语词溯源的（我认为这是该词典最大的缺点和失误），而注意溯源的《辞源》又偏偏没有收入“译学”，这就使得人们一直查不到“译学”一词之由来。

又直到 2010 年，最新修订的《辞海》虽然仍没有收入“译学”，但新增了“翻译学”一词。这应该是一个进步。但可惜的是其解释也不怎么科学：

【翻译学】 研究翻译活动的全过程，揭示其中的规律和特点，从而指导翻译实践的学科。具体内容包括翻译的性质和原

理、翻译理论和技巧、翻译单位和翻译方法、翻译人才的培养和翻译史等。

且不说该词条文理语句有欠清通(如“学”与“学科”是两个概念,不可混淆),即说“翻译学”的“具体内容”,何以包括了“翻译单位”呢?“翻译单位”是指有关翻译的机构、组织呢,还是翻译中的语法结构?“翻译单位”又怎可与“翻译方法”并提呢?真是有点莫名其妙。

我想,在辞书中出现的上述情形,是否也反映了人们对“译学”(或“翻译学”)的了解太少?是否也反映了“译学”至今尚未真正建立,或者说尚未被正式承认的这样一种现状?这是值得翻译工作者深思的。

但不管怎么说,“译学”一词早就有了。“译学”就是翻译学,就是翻译之学;或者说,“译学”一词的第一义项就是翻译学、翻译之学。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译学”或“翻译学”这些名词,我们的前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这个问题似乎至今还没有人探讨过。我想抛砖引玉,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翻译学”这个词,清代以前的古人是不会用的(这涉及古代汉语合成词的发展规律等道理,说来话长,这里不想展开)。我曾看到唐代诗人刘禹锡《送僧元旻南游》一诗,首句云“宝书翻译学初成”,但这诗句里的“翻译学”的“学”字当连下读。这个不能算。而“译学”一词,我以为至少应该在隋唐以前,公元六世纪,南北朝时即已有之;而且,这个词最早也应该是佛经翻译界所创用的。

至于“翻译之学”,本不是一个名词,却也要迟至清代才见到。如李文田《元秘史注》卷十四云“翻译之学未精也”,潘耒《遂初堂文集》卷三和《类音》卷一《音论》均收入的《反切音论》一文云“自梵典入中国,翻译之学兴”,《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三·经部·小学类存目一《华夷译语》之提要云“明人于翻译之学,依稀影响,十不得一”,张之洞《劝学篇》卷下外篇《广译》云“翻译之学有深浅”,等等。这以前,唐代有过“译经之学”的提法,见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二十二国》。但“译经之学”与“翻译学”的内涵有大小之分,不能等量齐观。倒是元代有“象胥译鞞之学”的提法,可以说是与“译学”或“翻译学”同义,见于元·吴澄《吴文正集》卷三三《送李见翁巡检序》。

今存隋唐时所编佛经目录,可看到有“译学士”这一称谓。如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译经》、唐·释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历代众经传译所从录》第一之五、唐·释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总集群经录》上之十、唐·释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七《总括群经录》上之七等,均载录有《佛顶咒经并功能》一卷,并均注明“保定四年,译学士鲍永笔受”。“保定”为北朝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年号,保定四年即564年。而南北朝时如果没有“译学”一词,何以有“译学士”呢?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四《义解篇》第二之一《唐新罗国顺璟传》,开头即云:“释顺璟者,浪郡人也,本土之氏族,东夷之家系,故难详练,其重译学声教,盖出天然。”这似乎也说明唐代已使用“译学”一词。

“译学”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包括些什么内容?如何建构?关于这些,学术界正在讨论,这里且不说。但“译学理论”也就是“翻译理论”,这是大家都这样通用的,《中国翻译》上《本刊宗旨》的英译文也是这样翻译的。虽然“译学”一词长期不载诸词典,但谁也无法否认“译学”早已存在的客观事实。

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受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辩证规律的支配:只要翻译实践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随之产生翻译理论。可是有人硬是说,翻译从来没有什么理论,也不需要理论;又有人说,外国也许有翻译理论,中国历史上却没有,或只有一些零星片断之说,充满歧义性和随意性,不值一提;另外,也有人说,我国有着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更有人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八个字来概括我国译论及其发展历史。这些说法对不对?我国历史上的翻译理论真的是那么不值一谈,或者到底是不是那样单条线的体系?为了解历史的真相,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有一部中国译学理论史。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一个理由。

翻译理论的深浅兴衰,取决于翻译实践对它的需要的程度。当今我国翻译事业的飞速发展,呼唤着译学理论的有力指导。例如,翻译在整个改造社会、自然环境的事业中起什么作用?翻译工作应如何组织?翻译工作者本身应具备什么条件?怎样才能达到正确的翻译?翻译的标准应该是什么?等等。关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前人或多或少有过一些探

讨和解答,可以供我们参考。不仅翻译工作者需要了解译学理论史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外语院系的有关教师也很需要了解这些以教导学生。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二个理由。

翻译理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无限过程。我国的翻译理论需要更新与提高,但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更新,在原有的起点上提高。而且,语言文字是最带有民族特性的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都深深植根于本国的历史结构和特定文化土壤之中,中国的译学理论自然也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的脉络,我们也不可能抹去民族的烙印。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更需要纵向的继承。因此,要开展翻译工作研究,提高译学理论水平,就必须首先研究中国译学理论史,先摸清“家底”,理清“家谱”,才能更图发展。这是撰写本书的第三个理由。

翻译理论本身是一个综合的、开放的系统,它与许多学科与艺术的门类息息相通,从语言学到文艺学、哲学、心理学、美学、人种学、社会学乃至数学、逻辑学和新起的符号学、信息学等等,都有关系;然而,它又自有其独立性。例如,它与语言学的关系最密切,相互有不少交叉和叠合,它可以借助于语言学的原理来阐发语际转换的规律等,但它并不依附于语言学。它可以运用文艺学、文体学的原理来阐述翻译中的风格、神韵等问题,但它也不归属于文艺学、文体学。反过来说,翻译理论的成果,也可以对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哲学等等的研究起到借鉴和促进的作用。例如,所谓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就必须求助于翻译理论为其媒介学的基础。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者,也需要有一部中国译学理论史作参考。这是撰写本书的第四个理由。

本书撰写动机交待明白,接着便再谈谈撰写方法。

翻译理论包括些什么?学术界有不少议论。有人认为就是关于“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之类的论述;也有人认为当分基础翻译理论、应用翻译理论,还有什么发展翻译理论等等。管见以为,参考西方文学理论家关于文学研究可分作“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说法,翻译理论也可分为这样两个方面;或者,可参照我国古代不少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的编辑形式,将翻译理论大体分为“内篇”与“外篇”两部分。

内篇(内部研究)即本体研究,为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如翻译的基

本理论模式,翻译的实质、原理、标准,翻译的思维方式,可译性问题,翻译的方法论(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程序论,翻译美学,翻译的艺术风格、技巧,等等。

外篇(外部研究)研究翻译与外界的关系。如翻译在横断学科网络中的位置,翻译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等的关系,还包括对翻译教学、翻译批评建设、翻译工作者队伍的建设、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翻译工具书和教材的编写、中外专家合作问题等等的研究。

当然,这样划分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机械的。例如,关于翻译的社会功能的研究,就很难简单地划在内篇或外篇,因为它既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又体现了翻译与社会的关系。再如,本书所进行的工作,又属于哪一类呢?因此,上面的划分只是大致的分类。其实,我们之所以提出翻译理论应该包括这样大的两个方面,乃是为表明我国历史上有关这样内容的理论,均在本书谈述的范围之内。

我国历史上的翻译理论,并没有自觉地、完整地建立如上所说的这样一个内外体系,还留有空白。但从总体上说,绝大部分领域或多或少有所涉猎,而在有的易为西方论者忽视的方面,论述还特别多(如近代以来关于翻译的社会功能问题的论述)。这显示了我们的前人历来对翻译的内外两方面研究都不偏废的好传统。其实,即使比我们更发达、更成体系的西方当代翻译理论,也很难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完备体系、科学构架的翻译学了。他们以往的研究中,似乎就有忽视外部研究的偏颇。他们的翻译理论史的空白也很多,也至今缺少一本合适的翻译理论史教材。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必太自卑。我们只能如实地写出自己历史上有关翻译的内外两方面的理论的内容,以显示其特点、优点和缺点。

我国译学理论的发展,基本上与翻译史相对应。至于翻译史的分期,似尚无专门的讨论,个别学者则提出过一些不同的说法。如周作人认为可分为三个段落:一、六朝至唐之译佛经,二、清末之译《圣经》以至《时务报》时代,三、经严复、林纾过渡到新文学时期(见本书第四章周作人一节)。裘柱常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唐以前的佛经翻译时期,二、清末传入西方文学、哲学、科学翻译时期(见裘氏《闲话翻译》)。马祖毅

则认为五四运动以前有三次翻译高潮：一、从东汉到宋的佛经翻译，二、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三、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翻译（见马氏《中国翻译简史》）。本书为叙述方便起见，分古代、晚清民初、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四个时期。

古代译论主要包括六朝至宋的佛经翻译和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两个高潮中的有关译论，而从先秦时有关翻译的零星议论开始说起，中间涉及少数民族零星译论，最后以新发现的乾隆初年《繙清说》为殿。

晚清民国初译论起于鸦片战争后，延至五四运动前。主要内容是维新派人士的译论，也简略介绍洋务派的翻译议论等，最后记述章士钊、胡以鲁等人关于译名问题的论述以及胡怀琛最早的译诗理论。

民国时期列述《新青年》、《新潮》、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 1920 年代新文学著名社团代表人物的译论，鲁迅、瞿秋白以及林语堂、陈西滢等 1930 年代各种不同倾向的代表人物的评论，以及三四十年代艾思奇、贺麟等哲学家关于翻译的理论等。

新中国建国后四十年间的译论，又可以“文革”为界分为两段，列述若干有代表性的译学家的译论，并论及老一辈革命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和旅居海外的和港台的译论家的论述等。

至于具体的写法，参考各种文学理论史等，似乎可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挑选一些重要的译论者，分别作介绍和评述；另一种是不拘泥于时间先后，而照自己的见解和“理论设计”，将有关材料重新组合，分成某种类型、流派等，予以综述。前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平，“只见树不见林”，成为关于一个个译论者的单篇评论的汇编；优点是可以对这些重要译论者论述得较为详尽，并为研究者提供较多的资料信息。后一种写法的缺点是容易写得浮，“只见林不见树”，在未深入发掘和详尽占有资料时容易“以论带史”，即把前人的观点剪裁了以后往自己的框架模式内填塞，而且，这种写法在突出主要线索后就只好放弃枝节，读者对每位译论者的了解便很不全面了；优点则是容易显出“理论性”和“体系性”。

我想，一般在专题研究刚刚起步、有关资料也远未搜罗穷尽的阶段，当以采用前一种写法为宜。（我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两位老师、今均已

作古的郭绍虞、朱东润先生的两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也都是用前一种写法的。)再说,以我的个性爱好与特长,也适宜用前一种写法,对后一种写法总觉得有点罗什法师说的“嚼饭与人”的味道。(当然,完全不“嚼”而吐出去的写法,也是不可取的。)我决定扬长避短,基本采用前一种写法,但有些篇节亦用综述。同时,力求不写成一篇篇单独的译论家研究,而注意每篇间的照应,尽量显示史的连贯与动态发展。也注意“立片言以居要”,突出其主要贡献,特别注意指出某一问题、某一观点是谁首先提出,某一译论家比前辈超越了什么、丰富了什么等。对于古代译论,因为留存甚少,而且如同大浪淘沙,遗存的片言只语大多好似金粒宝石,所以论述从详;对于近、当代译论,因为论者较多,很多论点又互相重复,所以只挑几位最重要的论者予以记述。我想,这不能说是“厚古薄今”吧?对于译论史上的空白,则只得如实反映,虚点联接。

总之,本书希望通过记述评说历代有代表性的或有较大影响和意义的译论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大致勾画出中国译学理论的轮廓和梳理出其流变的线索,或至少为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和管见。平庸之讥,知所难免。瓦釜微鸣,以待黄钟。幸勿以我为不知译海深浅者也!

目 录

引 言	i
-----------	---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译论

一 最早的译事及零星论说	1
二 支谦的佛经译论开篇	5
三 道安论“五失本三不易”	8
四 鸠摩罗什论西方辞体	13
五 慧远主张厥中之论	15
六 僧睿论翻译名实问题	17
七 僧祐论胡汉音义同异	19
八 彦琮的《辩证论》	20
九 玄奘的“五种不翻”	24
十 道宣批评历代译经	29
十一 赞宁总结译经理论	31
十二 少数民族零星译论	34
十三 传教士的翻译议论	38
十四 徐光启论翻译与超胜	42
十五 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	45
十六 杨廷筠呼吁翻译西书	48
十七 王徵的翻译资用思想	49
十八 魏象乾的《繙清说》	52
十九 章末片谈	54

第二章 晚清民初的译论

一 林则徐等开眼看世界	57
-------------------	----

二	冯桂芬的《采西学议》	59
三	洋务派的翻译主张	62
四	傅兰雅论科技翻译	65
五	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	70
六	康有为的翻译思想	73
七	梁启超对译学的重大贡献	77
八	严复杰出的译论建树 附吴汝纶	83
九	林纾的翻译理论	95
十	孙诒让论译学 附成本璞	102
十一	章太炎论翻译	108
十二	张元济论翻译 附孙毓修	117
十三	蔡元培论译学	122
十四	高凤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	126
十五	罗振玉的《译书条议》	130
十六	王国维论哲学著作翻译	133
十七	周桂笙与徐念慈的译论	137
十八	周氏兄弟的译论	144
十九	章士钊《论翻译名义》等	151
二十	胡以鲁《论译名》	159
二十一	胡怀琛论译诗	165
二十二	章末片谈	168

第三章 民国时期的译论

一	胡适、刘半农的翻译论	171
二	罗家伦、傅斯年的翻译论	178
三	郑振铎的译论贡献	183
四	茅盾的译论贡献	196
五	蒋百里借鉴西方译史	206
六	朱自清论译名和译诗	210

七	郭沫若的翻译论	214
八	郁达夫论“学、思、得”	221
九	成仿吾论译诗	226
十	闻一多论译诗	231
十一	邹韬奋的翻译论	234
十二	鲁迅对译学的重大贡献	238
十三	瞿秋白的译论贡献	255
十四	曾虚白论神韵与达	260
十五	陈西滢论形似、意似、神似	265
十六	林语堂的《论翻译》	269
十七	朱生豪、朱文振谈翻译	273
十八	艾思奇的《翻译谈》	276
十九	贺麟的《论翻译》	278
二十	陈康论哲学著作翻译	282
二十一	朱光潜的《谈翻译》	286
二十二	金岳霖论译意与译味	288
二十三	章末片谈	291

第四章 新中国成立后的译论

一	董秋斯论翻译理论建设	295
二	焦菊隐论翻译批评和直译	300
三	茅盾的纲领性报告	305
四	国家领导人谈翻译	311
五	傅雷的翻译观	316
六	周作人的译论新贡献	322
七	五六十年代其他译论家	330
八	钱钟书的译学贡献	339
九	旅居海外的翻译理论家	345
十	香港、台湾地区的翻译研究	354

十一	姜椿芳论新时期翻译	365
十二	黄龙的《翻译学》	368
十三	七八十年代译学概况	372
十四	章末片谈	383
余 话		387
翻译文论参考篇目		391
初版序(胡孟浩)		427
后记一		431
后记二		433

中国古代的译论

一 最早的译事及零星论说

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在劳动中创造了各自的语言，分属于各种语系。这以后，只要互相间有了交往的可能和需要，翻译活动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可以说，翻译的历史，从各地的原始人类开始以不同的语言作为工具而进行交流的那一天就开始了。可以想象，翻译的历史有多么悠久。而且，这里说的还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翻译，它自然略晚于语言之产生；但是，如果把手势语、图形文字之类的也算作语言，把符号翻译也算作翻译的话，那么，显然翻译的历史也就与语言的历史同时开始。

众所周知，早在史前时代，我国不同地区的部落、民族之间就开始了交际和融合的过程。而我们华夏民族与遥远的异邦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很早就开始了。例如，据古籍记载和学者的研究，远在夏代，我黄河流域的先民就已同外贝加尔湖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居民有了来往。最早称为“狄历”的居住在“北海”（贝加尔湖）的丁零（丁灵）民族，便在夏代“会于中国”，是《虞书·益稷》所谓“弼成五服”、“外薄四海”之一。（参见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宋代根据唐宋以前古籍整理而成的大型工具书《册府元龟》的《外臣部·朝贡》里，有不少“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之类的记载。这些前来朝贡的远方使者，语言不同，必须要有翻译才能交流。当然，我们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上没能找到与翻译有关的文字，这是与甲骨文只是卜辞的性质有关。

但西汉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在卷四《王道第六》中称早在“五帝三王”时就有“四夷传译而朝”之事。而相传汉初伏胜传授的虞夏商周之史书《尚书》中，则确凿记载了夏朝末期以来的大量“重译来朝”。据清·陈寿祺辑校的《尚书大传》卷二《殷传·汤誓》，就有“桀无道，囚汤，后释之，诸侯八译来朝者六国”（辑自《北堂书钞·十·帝王部·来远》等，所谓“八译”，就是通过八重翻译，可见当时翻译的艰辛）；同卷又有“武丁内反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编发重译来朝者六国”（辑自《艺文类聚·鸟部》、《太平御览·九一七·羽族部·四》，又《御览·八十三·皇王部·八》、《论衡·是应篇》、《后汉书·郎顗传·注》、《记纂渊海·六十六》等）。《尚书大传》卷四《嘉禾》又载“成王时，有苗异茎而生，同为一稂，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问之，公曰：‘三苗为一稂，抑天下共和为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译而来”（辑自《太平御览·八三九·百谷部·三〇》、《初学记·二七·草部》、《记纂渊海·四》等，《白虎通德论·五·封禅》也有类似记载）；同卷又有“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辑自《太平御览·七八五·四夷部·六〇》，又《御览·天部·九》、《后汉书·马融传·注》、《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注》、《事类赋·三》等，相似的记载又见《说苑·十八·辨物》、《通曲·七四·宾礼·一》等等）。

而那句经过三位翻译相递而译（“三象重译”）的“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就是唯我中国才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早的三千多年前的口译的记录了！在这句话中，也第一次论述了翻译的必要性。而据西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五、刘向《说苑·十八·辨物》等书记载，这个“象”翻译了上面这句话后，周公表示谦虚，“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这就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三千多年前的第二句口译了。

据《礼记·王制》，周代对专管各方的翻译人员有种种不同的正式称呼：

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据东汉·郑玄的《礼记注》，这些“皆俗间之名，依其事类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更一一作了解释：“寄，言传寄外内语言”，“象者，言放（倣）象外内之言”，“狄鞮者，鞮，知也，谓通传夷狄语与中国相知”，“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而唐·贾公彦的《周礼义疏》又解释说：“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总之，这四个名称的意思是相似的，故古代又有“象寄”、“鞮译”等名称。后来，对翻译人员又有更加通俗的称呼。例如，《吕氏春秋·功名》提到“蛮夷反舌”，东汉·高诱注：“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又同书《为欲》高诱注：“反舌，夷语与中国相反，故曰反舌。”可见古时称外国语言为“反舌”。而《国语·周语》中提到：“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三国·韦昭注曰：“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职也。”可见古时又称翻译者为“舌人”。

那么，为什么后来只通用“译”或“翻译”呢？据宋僧赞宁的《宋高僧传》卷三云：“疑汉已来，多事北方，故‘译’名烂熟矣。”其后，宋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卷一中则肯定地说：“今通西言而云‘译’者，盖汉世多事北方，而译官兼善西语故。摩腾始至，而译《四十二章》，因称‘译’也。”看来，即是从汉代起，因为政治、军事上与北方的交涉最重要，所以“译”便成了总称。而“翻”字的出现，据赞宁说，也是起用于东汉摩腾之译《四十二章》。至于“翻译”两字的连用，至少在南北朝时的佛经译者已开始了。

前已说过，理论起源于实践。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将随之产生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翻译活动自不例外。当然，刚开始的翻译理论只能是极简单、极粗浅的。而且，人类最初的翻译活动是口头进行的（上述“舌人”的称呼就说明了这一点），最初的翻译理论自然也只能是口耳相传，而很难记载下来。上面引用的那些古书上有关翻译的记载及其注释，其中也反映了古人对于翻译的性质与功用的认识，未知能否算作最初的翻译理论的子遗？

西方学者论述其翻译理论史，有的是从公元前46年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论演说术》一文中关于“不要逐字翻译”的一段话开始的。而他们历史上真正可称为译论的，最早大概是1530年德国宗教改革领袖路德写的《论翻译书》一文。在我国，虽然译事记载极早，但很可惜，在先秦诸